

报告称我国每 1300 人有 1 个千万富豪

8月14日，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正式联合发布了《群邑智库 2013 胡润财富报告》。这份 40 页的研究报告详细剖析了目前中国富裕人士的数量、地域分布情况以及投资方式、消费方式、媒体使用方式，能够帮助市场营销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富豪的生活方式，进而找到有效地和中国富豪沟通的方式方法。

这是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连续第三年联合发布中国财富报告，也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五年发布此报告。

报告显示：

1、全国有 105 万千万富豪和 645 万亿富豪，分别比去年增长 3%和 2%，增速连续 2 年放缓，为 5 年来最小。

截至 2012 年底，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1 亿亿万富豪及以上人数已达 105 万人，比上一年增加 3 万人，涨幅 3%；其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 645 万人，比上一年增加 1,000 人，涨幅 2%。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增速已连续 2 年放缓，且均为 5 年来最小涨幅。目前，全国每 1300 人中有 1 人是千万富豪，每 2 万人中有 1 人是亿万富豪。

2、北京富裕人士最多，排名第一，广东次之，上海排名第三。天津增速最快，浙江和内蒙古减少最多。

北京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 5000 人，达到 184 万人，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 200 人，达到 1.07 万人，全国排名第一；广东有 172 万位千万富豪和 9600 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 147 万位千万富豪和 8,500 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三。天津是增速最快的一个城市，有 19 万位千万富豪和 1,400 位亿万富豪，分别比去年增加 11%和 12%，全国排名第 10。其他增速较快的还有山东、河南、云南、贵州、青海和西藏。六成富裕人士在非一线城市，例如杭州、宁波和佛山，千万富豪人数均在 2 万以上。调查还显示，虽然全国富豪数量普遍呈增加趋势，但也有部分地区富豪数量有所减少，其中浙江和内蒙古富豪人数减少最多。

3、1/4 的富豪表示对未来两年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较去年下降 3%，是前年的一半。

表示对未来两年的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的富豪占受访富豪的 25%，比去年少了 3%，而前年这一比例为 54%。表示还算有信心的富豪则比去年增加了 2 个百分点，为 66%。而表示没有信心的富豪比例有 9%，比去年增长了 2 个百分点，为三年来的最高值。

4、中国富豪幸福指数达到 78（满分为 10）。富豪最想拥有的是健康，1/4 的富豪不满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群邑智库 2013 胡润财富报告》首次引入“企业家幸福指数”这一概念，胡润研究院从家庭、工作、健康和个人生活四个方面研究

企业家的幸福感，受访者被要求从 1 到 10 分为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结果显示：中国富豪幸福指数达到 78(满分为 10)。73%的富豪认为自己比上一代幸福；家庭生活给予的幸福感比工作带来的更多；女性富豪的幸福指数达到 8,略高于男性富豪；30 岁以下富豪的幸福感明显低于年龄较大的富豪，尤其在工作方面。

相比爱情、时间、他人认可、学习机会和物质需求，富豪最想拥有的是健康，最担心的也是个人健康问题。超过 1/4 的富豪不满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另有超过 1/3 的富豪认为自己运动不够。女性和年轻富豪更在意自己的身材。近 3 成富豪认为自己的工作生活不平衡，年轻富豪这方面困扰更多。近 2 成女性富豪有睡眠问题。

此次研究的其他有趣发现还包括：

1、全国有 8,100 个十亿富豪和 280 个百亿富豪。

2、中国千万富豪主要可分为四种类型：企业主、“职业股民”、“炒房者”和“金领”。其中“职业股民”比去年减少 5%，“金领”比去年增加 5%。亿万富豪主要可分为三种：企业主、“炒房者”和“职业股民”。

3、房地产在调控压力下仍是富豪投资首选，比例达到 64%。但富豪也开始积极寻找新的投资标的。

4、受访富豪平均财富 5900 万，平均年消费占平均财富 3%。旅游仍是主要消费所在，占三成。富豪日益追求独特的旅行体验，一些特殊旅游目的地地受到欢迎，如非洲和极地。

5、千万富豪每月出差比去年减少半天、亿万富豪每月出差比去年减少 3 天；千万富豪出国频率从去年的 3 次下降到 28 次，亿万富豪出国频率从去年的 42 次下降到 34 次。

6、伴随海外教育的风潮，海外置业的趋势已明朗化。美国成为中国富豪海外置产首选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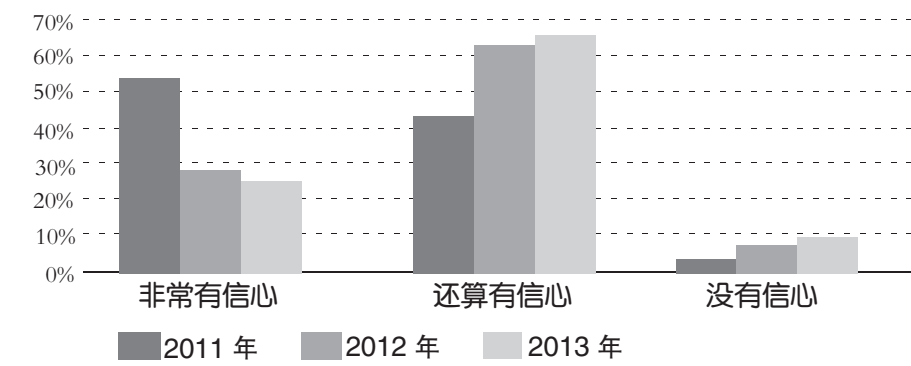
7、8 成富豪使用微信，已超过微博(7 成)。

使用微信的主要功能是与朋友交流与互动。

8、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中国富豪今年的关键词是‘健康’和‘幸福’。”

群邑中国首席知识官罗 אז则表示：“虽然中国富豪人数的增长率为 5 年来最低，却让我们得以借此机会，透过他们对消费、投资的偏好，对健康与幸福的理解方式，对社会责任的看法，一窥富豪们在大环境不确定中所流露对生活追求的转变。这对品牌营销人员而言，在研拟品牌沟通策略时，将更有助于从深层的需求来思考品牌可提供的价值。”

富豪对中国经济信心指数



发挥企业兼职纪检委员作用的思考与探索

■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二公司纪委副书记 苗学利/文

纪检委员作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参与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工作，其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纪委工作开展深度与广度，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至关重要。然而作为国有企业纪委的特殊性，纪委会员中除书记、副书记外，大都是由企业部门负责人兼任，委员作用的发挥更具有其特殊性，是企业纪委有效开展工作，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状与分析

目前企业纪委会员大多是企业财务、人力资源、管理、审计、党委组织部门、物资管理等部门负责人，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个人的业务工作都是企业管理的重点，在企业管理活动中责任重大，从纪委工作有利的一面讲：他们业务精通，了解企业业务工作极有深度，易于发现问题，便于纪委工作的开展。由此带来的问题一是：自身业务忙不过来，无法抽身参与纪委工作。二是大都是业务出身，对意识形态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知如何做。三是苟于部门自身利益，无法大胆开展工作。这些问题的由来是由于企业的特点所决定，有其必然性和历史惯性，也是企业纪委自身无法改变的现实。

从纪委工作自身建设角度看：兼职纪检委员们，具有相当的政策理论水平 and 较高的政治素质，这是担任权力部门负责人的基本条件，是纪委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成为纪委会员候选人的理由，这就为进一步搞好纪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挥好兼职纪检委员的作用是企业纪委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如何发挥兼职纪检委员作用的途径，探索

如何发挥兼职纪检委员作用的方法就是纪委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和条件也是事物发展进步的基本保证。从企业现状来讲，纪委工作涉及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党委的领导，按照党章规定：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就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的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格局，党委工作是否有力，方法是否适当都构成了纪委工作能否得到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能否调动和发挥好兼职纪检委员工作积极性重要基础，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必然致使在党委领导下的纪委工作受到阻碍，造成纪委工作受重视程度不高，最终影响纪检委员作用的发挥。

二是企业行政的有力支持，企业纪委围绕企业的经营、生产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是企业纪委不变的宗旨。赢得企业管理人员的理解和支持是开展好纪委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增强和调动兼职纪检委员工作积极性的最有效措施。其中既有纪委通过宣传和积极工作赢得行政理解与支持的问题，同时又有行政领导人员对纪委工作全面认识和理解的程度而导致的支持力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好坏直接影响纪委工作开展顺畅与否，最终导致兼职纪检委员是否大胆顺利、而不是左右为难的工作开展的程度。

三是纪委自身工作问题，如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检查分析纪委工作在调动与发挥兼职委员作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搞好自身建设的重要保证，秉持着一个什么样的纪委工作理念、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纪委工作方法直接关系着纪委能否发挥好兼职委员

工作积极性。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站在纪委自身建设角度，笔者认为影响兼职委员工作积极性的原因有以下问题需着力加以解决：

首先，应该看到多年以来由于纪委自身宣传不够、抑或是工作思路不清晰，满足于督促、查案，忽视对自身工作理念的宣传，造成纪委工作“神秘化”现象，纪委工作服务服从于企业中心工作的理念，不仅是一般职工、即使是纪委工作人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还存在一些误区，落实中还存在“跑偏”现象。

其次，纪委会员参与纪委组织、领导工作，相应权利义务还不能得到较好落实，与纪委会员相适应的地位还不能激励他们从事相应的工作。由于工作内容的不同，兼职委员对纪检监察工作不熟悉、不了解，不知如何利用自己的纪检委员身份开展工作，对纪检委员的身份认同感还存在差距，或者对此身份不以为然，认识不到纪检工作与自身业务工作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些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兼职纪检委员对纪检工作不热心、不关心。

对策与探索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和探索，中铁电气化局二公司纪委几年来，结合本单位实际，循序渐进，不断深化工作力度，取得了一定效果。

五年来，纪委在不断探索中逐步深化对发挥兼职委员作用重要性的认识，确立了做好此项工作的原则：一，坚持党委的统一领导，积极促成企业对纪委工作的大力支持，并创造有利于纪委开展工作内外部环境 and 作用发挥的基本条件。二，坚持不断地对兼职纪检委员进行培训，提高兼职纪检委员做好纪委工作的责任心和工作的自觉性。三，创新制度，为兼职纪检委员开展工作创造机会。四，注重宣传教育，努力营造良好的纪检工作氛围。具体做法是：

一、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积极做好组织协调
几年来，我们深切的体会到，纪委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组织协调作用，不仅是工作协调，也包括人际协调，从而确保纪委组织各项活动的有效开展，企业纪委书记要充分利用好自己的职务便利，适时地发挥好自身作用，具体就是：一是利用党委委员的身份，在召开党委会上，督促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分析、部署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发挥兼职纪委会员作用的意见建议。几年来，每年年初都要在党委会专题研究一年来党风建设的得与失，有针对性地提出当年党风建设的针对性措施，都得到了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而也作为兼职委员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利用公司领导的身份，利用召开纪委会工作会、到基层检查工作的机会，有意识的宣传兼职委员的作用，提升他们在工作中的地位，为他们提供展示的平台，督促基层重视发挥兼职委员的作用。

二、坚持搞好兼职委员的教育培训
坚持每年举办一次纪委会员培训班。公司纪委高度重视对兼职委员的培训工作，同时也得到了公司党委、行政的大力支持，为办好培训班，纪委每年都要及早准备，从教材、教师 and 培训地点都要认真谋划，在培训班上着重学习《党章》，着力增强兼职委员的责任意识，一面学习，一面交流做好兼职委员工作的经验教训，同时通过看光碟，购图书等形式，激励大家主动学习，增强当好兼职委员的责任感和工作水平。

三、创新制度，为兼职委员提供工作平台
兼职委员作用的发挥不能只靠个人热情，没有制度保障终会是短暂，几年来我们一方面在纪委的各种会议上要求兼职委员参加，共同讨论纪委工作。一方面注重制度创新，通过制度要求规范兼职委员，先后制订了《项目部党风责任制实施细则》、《在工程段开展党风建设评议

活动的通知》、《构建教育、监督、惩治腐败体系工作规划》、《机关各部门落实“工作规划”责任书》和劳务用工公开招聘办法、物资公开采购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措施，在这些制度制订中有意规定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兼职委员）的职责，既有效地推动了公司纪检工作的开展，也为兼职委员开展工作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注重宣传教育，努力营造良好的纪检工作氛围

作为纪委的宣传教育，我们一直注意到两个层面：一方面是针对干部、党员所进行的反腐倡廉教育，另一方面是面向企业的各方面的有关纪委工作思路、原则的宣传。因此在宣传形式上，我们既注重面：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宣传和办专栏、贴标语，开办网页、在企业小报上连载等形式，大力宣传纪委工作理念。同时又注重点：即通过党委会、中心组学习、支部党课、各类培训班等形式，向领导干部、“三管”人员和党员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廉洁从业教育。从而使纪委的教育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又为纪委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通过这些举措，较好地激发了兼职委员的工作积极性，积极参与纪委的各项活动，为研究分析企业纪检工作状况提供智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公司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发挥企业纪检兼职委员作用，只是企业纪检工作体系中的一个工作环节，需要同企业纪检工作的其他各方面协同一致，才能共同促成企业纪检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国企改革走到今天，体制、机制的矛盾日渐突出，各方利益争夺更加激烈，企业纪检工作尤显任重而道远。纪检监察工作只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开拓创新，不断紧随企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要求，创新纪检监察工作的方法与手段，为维护企业健康发展和党员干部队伍的优良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官员推诿地方债：上届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

■ 《瞭望》新闻周刊/文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地方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地方对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基本可控”。采访中，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主要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而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有多少说不清；债务使用绩效不高，甚至有地方债务资金闲置两年没用；债务管理缺少科学的债务确认标准，使政府性债务风险难以评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县乡基层领导没有良好的“债务意识”，“风险意识”，而且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这是地方债务逐年增加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的考核亟待制定相应的“债务指标”。

税源结构单一致债务放大

基层政府税收结构单一、薄弱，抗风险能力偏弱，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大的主因。山西吕梁市方山县 2012 年财政总收入 84 亿元，其中 6 亿元收入来自一两家煤企，属于“一煤独大”式财政，当地 2012 年的取暖工程中还有 2000 多万元债务无法落实；2011 年的三项整治工程债务还有数千万元。

山西省安泽县常年税收上缴压力大、可用财力少。近年来几乎每年上划财政都占当地财政收入 65%以上，迄今为止还有历史欠账近 2

亿元未消化。到 2017 年之前，每年用于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 2500 万元左右，给县级预算安排带来了严重的压力。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辛庄镇自身的稳定税源只有 3 个小企业，财力很弱。镇长朱效波说：“即便是有高铁、高速路的前两年，每年镇上资金缺口都近 2000 万元，如今还拖欠了五六千万元历史债务。”

与此同时，对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改造城乡环境”，也是造成地方债务“越滚越大”的根源。我国各省区对未来 5 年城镇化率指标都很高，安徽是达到 55%，河南 52%，西藏 35%，广西 53%，湖北 58%，云南 48%。但发展速度快的背后，仍然是简单的大规模投资。如陕西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 16 万亿元，山西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 11 万亿元，广西的目标则是 2017 年投资达到 3 万亿元。

海通证券的一项调研表明：2009—2011 年是我国城镇基建的高峰期，在 9 个有据可查的样本中，7 个样本近年累计基建总投资占地方一般财政预算年收入的 8—10 倍，或是一年基建投资占一般财政预算年收入的 1—2 倍。江苏海安财政局局长张忠宏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投入，对地方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真正能用现有财力去进行城镇化的县乡很少。”

化债手段只有融资和土地

国有企业税收上缴中央、资源税上缴省市

……由于主要税种都集中上缴给了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市级财政，只有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能够一次性给予地方大量财政收入。因此，地方市县政府化解地方债务的办法就离不开“融资”和“土地”，这就形成了盲目投资、脱离实际、过度举债的“逻辑根源”。

我国城市投融资平台主要集中在省级和市级。不少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自身在地方银行中“一股独大”的优势，“借道”地方银行谋求“发债”。广西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在前几年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形成了大量地方债务，如今进入还款高峰期。仅柳州市全年要偿还的地方债务就超过 100 亿元，而当年财政收入不过 200 亿元。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与多个地方政府签订了金额超过 200 亿元的城镇化贷款意向协议，注入城镇化建设。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获多家银行总额达 600 亿元的意向授信，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月宝说：“这些项目其实还是‘寅吃卯粮’，地方政府以规划手段，以可用财力的 3—5 倍安排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款结算款延期支付，但只用 2—3 成的财政支付完成全部工程建设的目标，其他 7—8 成的工程款则由民营施工企业垫付，最终还是暗藏巨大危机。”

而县级政府主要“靠土地”。新疆轮台县财政局局长保剑强说，2010 年成立地方融资平台，2000 万元注册资金，每笔担保 200 万元。现在担保了 7000 多万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土地进行质押。山东淄博市青阳县财政局局长孟军告诉记者，近年来，青阳县历史负债已经达到了 10

亿元左右，县里通过市级城市资产运营公司来拍卖土地，拍卖价格最高的达 120 万元/亩。为拿到土地指标，县里不遗余力地推行合村并居、旧村改造，集中社区，为土地指标开路。

缺少土地指标的地方财政危机日益暴露。江苏省海安县的土地利用规划到 2020 年可用土地指标为 20000 亩，但到 2012 年土地指标仅剩 2000 亩，土地指标的严重受制，必将成为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瓶颈。

乡镇政府只好“靠补贴”。莱芜市某镇累计负债超过 8000 万元，2013 年的财税收入要完成 4200 万元基本上是“天方夜谭”。该镇政府负责人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担任镇长，他总结化解乡镇财政困难方式为“一靠转移支付，二靠上级补贴，三才是靠当地企业”。

“债务指标”亟待建立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地方领导只有近忧无远虑，只管眼前事、本届事。一些领导坦言：“上任借了钱搞工程、搞项目，有口碑也有政绩；本届政府绝不能勒紧裤腰带还债。”一些地方甚至流传着“干满一届是熊蛋，两年有效是水平，三年挪窝有能耐”。这种政绩观迫使地方领导想方设法举债度日，收支平衡、地方发展风险等不进入考核视野，自然不会形成“长效机制”。

一些地方干部及专家认为，要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必须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就任之初、离任之时进行地方债务审计、债务公示和债务考

核，形成地方政府可控的举债、还债机制。

首先，要使地方债务摆上台面，将县乡财政透明公开常态化。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发展博士杨天保认为，县乡财政收入支出要取信于民，就应该向老百姓公布一本看得懂的财政账目，使老百姓知道政府借债是否干了实事，逐步形成老百姓与地方官员对“是否借债、借债规模、偿债形式”等问题的关注度。

其次，构建资本性预算体系，尽快出台针对县乡基层政府的债务考核制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以中央财政的能力化解目前地方政府负债难题不大，但必须高度警惕债务增量的出现。这就需要尽快在省市县一级构建资本性预算体系，同时出台对基层政府的债务考核制度，从“制度建设”和“官员政绩”两个角度来形成地方债务问题的良好机制。

其三，在适当的时候，有选择性地为地方债“松绑”。一些学者认为，地方债的发行是解决地方经济长期发展的国际惯例，中央政府应尽快布局对收入稳定增长、还款来源可期的地方，给予发行地方债的鼓励性措施，将目前通过地方政府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发债等“遮遮掩掩”的地方债务“阳光透明”化，实现“开前门，堵后门”的目标。

其四，积极探索城镇化投入新来源，逐步化解系统性风险。专家认为，城镇化建设带来庞大资金需求，需不断引入和完善市场化的融资模式，综合运用长期债券、信托、股票等市场化融资方式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难题，土地的增值收益也可用于逐步偿还地方债务。